

中医发生学探微

● 谭春雨 著

ZHONGYI FASHENG XUE TANWEI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AZD015）

中医发生学探微

谭春雨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发生学探微 / 谭春雨著.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32-1577-0

I . ①中… II . ①谭… III . ①中医学—医学思想—思想史 IV .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989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鑫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410 千字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1577-0

*

定价 4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内容提要

本书综合运用逻辑、文献、考古、训诂等研究方法，以神学、甲骨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易学、道学、理学、神话学等知识背景为基础，详细探讨解读了数千年前中医学学术思想发生形成的过程，揭示演绎了中医学一系列临床理论实践体系的内涵本质及精髓所在。

本书认为临床实践经验是中医学赖以发生的基石，巫祝医学是孕育中医学的文化摇篮，根植于先秦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中医学的思想灵魂，脏腑理论、命门三焦理论、伤寒六经理论、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等皆是基于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产物。为方便读者更深刻认识中医学当前所遇到的文化认知困境，本书最后特精选几则近代以来批判中医学理论思想文化的代表性文章，以便作为靶子，供我们共同研读思考。

本书不仅在中医学上有许多重大新识和发明，还在中国传统哲学、宇宙演化学、天文历法学、神学、易学、道学、神话学等领域有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所以，本书不仅适合中医从业者阅读借鉴，也适合关心好奇中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借鉴。

中医理论天上来

——序《中医发生学探微》

孟庆云

《中医发生学探微》一书，既是一部探讨中医学原始发生的科学史著作，也是一部挈要从本，解读真义的理论专书，更堪为一部阐述中医学术思想特征的开山之作。

本书论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观点：原生文化的究天人之际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也是中医学理论的渊藪。无论是从文化背景，还是从宇宙哲学，乃至具体的元气阴阳五行、四时六气、三焦命门理论；无论是从信史时代以前的巫祝医学，还是体系构建以后的几种模式演进的历史时期，中医学这一独步天下的思维认知创造皆导源于此。

作者谭春雨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致力于中医理论、医史文献研究已十余年，躬耕尺幅，力辟群说，钩隐发微，穿越时空，有此开创性著作，令人不胜欣喜。

以天为研究对象而发生了医学。远史先民世代代观察最多、重复再现的就是天象。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月亮每月圆缺盈亏，群星璀璨，斗转星移，这些不仅使古人感到惊奇，而且都与实际生活及需要有联系。

劳动要日出而作，移居寻食走路要以太阳为指南，夜间行动或航海则以星月作指导，四季寒暑的更迭可由观察星象发明历法而知晓。这些与时间联系的天象，都成了当时最基本的概念。

《左传·昭公七年》谓：“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天文学是最早发生的文化，测量天体的数学也是最早发生的文化，《周

《髡算经》就是测算天象的著作，农学和医学也都是和天象、时间联系而发生的。除天算、农学、医学之外，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兵学乃至政治学也皆如此。

可以说，古代的各门学术都始于“究天人之际”的。古人相信：“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气交变大论》）医学也不例外，当是始于“言天应人”的。在图腾时代和神话思维时代，古人就开始把疾病与天联系起来，特别是季节病和群发的瘟疫。

天元四灵源自天象图腾，群星交替映辉显现季节交替的规律，某星当令是某种气候的征兆，各季节有不同的常见病、多发病，古人以此最重视“因天之序”（《灵枢·客邪》），即重视宇宙的时间结构成为中医学特点之一。

按五运六气学说的理论，认为瘟疫的病根在天上。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气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认为地面瘟疫流行，其本在五行星的“形精之动”，但可以凭观其象可知也。中医学就是按照这种天人合一概念，主客一体的思维方式，从天和人浑然一体入手，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的。

从天文学的理论发生了医学理论。作者在本书中不仅论述了中医学原理及基本理论导源于天文学，还一并阐述了“医易同源”及联系医学的易学理论也发轫于天文学。这也使本书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解读《周易》的著作。

对待生命，从“生生之谓易”的基点发展起来的生成论，成为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核心理念。认为生命之初即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之后整体地发展，生、长、壮、老、已。这一理念，大异于西方生命科学的构成论。

本书超越了研究存在，致力于研究演化和生成，让时间、历史、理论演化的过程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成之道”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也解读了《周易》诸种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易学与生命的关系，从这个视角看，本书从生命科学而解读《周易》，有很多新识和发明。

作者率先对近代以来包括教科书等对阴阳学说的谬解进行拨乱反正。指出：“现代学术界在阐述阴阳学说时，多将阴阳作为一对表征事物二象对立矛盾属性状态范畴的概念来看待。”这是套用了矛盾论的对立统一，把中国传统

的一元和合曲解为西方的二元对立，是当时学术上滥贴政治标签的产物。

其实，阴阳是对宇宙间同一事物两种势力形式的概括，导源于“应象”的认知方式。阴阳间如太极图之离合互根，不能分割。作者明确指出，这种“二象对立矛盾属性范畴，无论是理论逻辑构建形成方面，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矛盾”。

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三皇时代，是史前的图腾传说时代。作者据文献、考古、天文、历法等资料的分析，指出史书前的三皇时代即有四时阴阳五行学说的滥觞，并以此论证了《周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的科学原旨。

燧人氏是三皇之首，以太阳为图腾，《尸子》记载“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此“五木以为火”即是五行五色之属，是五行学说的先声。在始作八卦的伏羲氏时代已系统论述了“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此四象就是四时阴阳五行之象，其传承的河图洛书是上古四时阴阳五行的表达模式。而到了神农氏时代，据《尸子》记载，已经“正四时之治，万物咸利”了，这是依据所建立的四时历法学得以实现的。

作者对五行有独到的认识和自己的定义，指出五材说、五星说、五方说、五元素说等均不足持。作者吸收了李约瑟从运动、变化、过程分析五行，并结合天象、四时之气、天干地支之应、河图洛书的数学模型而循踪明义地称道：五行的本质是天地四时阴阳合和之气，在五帝时期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五行学说思想体系。

作者对五行学说形成时间定位的这一重大突破，除考证了《逸周书》、《尚书》、《竹书纪年》、《左传》、《礼稽命征》、《史记》、《吕氏春秋》等史料外，还结合出土文物、天文历法和符号学等知识创辟而解。

关于三皇五帝的时代，史家较一致的认识是，神农以前为三皇时代，黄帝以后为五帝时代。五帝指黄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和舜，在6000~4000年这段历史时期。作者以此把五行学说的形成时间，提前了近2000年，并可堪定谏，这是一项文化史上的重大成就。

本书在深研古典和现代哲学、易学、道学、理学、史学名著和医学经典理论的蕴积萃厉中，抉发创辟了自己的宇宙哲学。我阅读本书后，大致归纳

为以下几点：

1. 宇宙由元气构成。元气是宇宙“至小无内”，不可再分，永恒存在的物质本体。元气有机聚合状态为“有”，元气自由离散状态是“无”。推动、表征元气运动是谓“道”，“道”即元气的运动性。

2. 以“道”名称的元气运动性是元气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元气的运动性以相互依存转化的二向对立矛盾性为基本特征，《周易·系辞》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即是此意。“道”的这种正反二向对立运动消长转化机能正是主导元气聚散离合的理则根本。

3. 在“道”的正反二向对立运动消长转化机能推动下的元气运动聚散离合首先应象为阴阳，阴阳再应象天地四时为五行之气及六气等。所以，五行六气学说等皆是元气阴阳理论思想的产物。阴平阳秘是阴阳间一种和谐状态，也是宇宙有形万物稳定存在的前提基础。

4. 原气、生殖之精、宗气、营气、卫气、血气、津液之气等各类生命精气皆以宇宙元气为根本。但人之精气并非质性同一，至小无内的微小单元的宇宙本体元气，也绝无纯阴、纯阳之气，而是四时阴阳之气历经先后天合和制化之气。

5. 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都是象。《周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运动之象，是理象、机制象，所以谓之“形而上”；元气及其阴阳五行六气万物是存在象，是质象、形象，所以谓之“形而下”。

6. 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都是象。二者卦符的本质，是以先天与后天的理念表述生命的四时阴阳特征。先天八卦是表述化生自然界生命万物的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盛衰、升降、离合等象，后天八卦是表述自然界生命万物的四时生长收藏之象。

7. 人是天地之合气，天地之气合和为生之大经。按易卦理论，生命是“战乾”、“劳坎”、“成言艮”的过程。人的脏腑五官等皆效法天地四时阴阳五行，六腑法天，五藏象地，人之五官比类于世俗之官，世俗之官最早发于巫祝时代的神道之官。

8. 天地之序的节奏也是生命的规律，天地之气的变化同样深刻影响着生命的机能活动，所以天忌不可不知，天道不可不法。原始中医学从天地论人

体，大异于西方医学就人体论人体。始于巫祝医学的究天论人，作为先源，一直指轨着后来中医学的发展道路。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论成分强于选择论成分。

9.《周易》卦的本质是弥纶天地的宇宙模型，是源自“仰以观于天象，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的“易与天地准”之法的创造。其宗旨在于“《易》以道阴阳”的“顺性命之理”，这也正是医学的宗旨。中医学和《周易》，从观天的起源到理论目标都在于“顺性命之理”，可见“医易同源”之论不谬。对于阴阳，惟“立象以尽意”，故《内经》尚其象，如藏象与《周易》一致。

对于天文历法、医学、易学、道学、理学、哲学、历史、诸子百家有关论述的考证后，作者勾勒出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形成的基本过程的阶序。大体是：先民在生活生产中的观察实践，由是而肇发了天文历法纪时之学，进而发生了对天地万物演化思想规律的认识。

在这点上，作者概括为“元气阴阳四时五行六气论”，这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思想的核心，由此而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的宇宙演化之学、医学、哲学和诸子百家之学。并据此破解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等神话，使之有口传史学的价值。

元气阴阳四时五行六气论是全书的纲领。作者典言，此论对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形成过程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也是全方位的和决定性的。全书即以此为框架对中医学基本理论从诸气、阴阳、命门三焦、脏腑理论、六气与伤寒六经、经络理论等逐一阐述。

其中，作者提出的“命门三焦理论”是递起演明的悟造创解。

“命门”一词，《内经》言“命门者目”，《难经》以右肾为命门。到了明代，临床实践的发展，五脏六腑的理论在解说生命主宰层次及精气演化过程时远非所及，而在哲学上又受到宋代太极图论说的影响，医学家们接受了“人人各有太极”之论，开始探索以命门为脏腑甚至是更高层次的脏腑，于是有多种命门学说乘时而起。

例如虞抟的两肾命门，李时珍的先天精腑命门，张介宾的水火命门，孙一奎的动气命门，赵献可的君主命门，等等。命门学说在明末还成为支持温

补学派的理论之一。

但命门学说因各家的论说都有其不完备性，认识不一而始终处于“各家学说”状态。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中医界曾举行过一规模较大的讨论，不仅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以致右肾命门之说声响颇重，是论现在仍写入某些《中医学基础》教材之中。

作者对命门以先天之本，后天之基立论，统理了命门—原气—肾间动气—三焦的关系。即：两精相抟后，先天之精气在人形初定后藏化于命门，之后气化为原气和生殖之精。生殖之精贮藏，原气经肾间动气到三焦，从三焦而到全身，这即是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三焦为“命门之用”的关系。

此番疏解，使命门学说在理论上有清晰性，逻辑上有自治性，并结合临床，分立了命门阴阳两虚、命门阳虚火衰、命门元阴偏虚三种证候类型，各列有治疗药物和方剂，由是而使命门学说成为一个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藏象理论。

三焦一直是自《内经》立论以来，别解最多、尚待统一的理论。近百年来，其研读者的假说也多。如关于其形体有腔子说、油膜（大网膜）说、淋巴管说、水道说、三个热源地说（日本学者）等等，各说齐陈。

作者以本书阐述的元气理论的诸气为基点，对历代医家论述三焦的一致之处包综辐凑，包括《内经》、《难经》、张仲景、王叔和、陈无择、李东垣、李时珍、赵献可、张介宾等的见解。指出三焦的脏腑本质是泻而不藏，其气象天的独大而有名无形的孤腑。

在通行原气的功能上，命门与三焦是表里关系。三焦为诸气（或称为三气）气化之总司，对呼吸之气、水气、谷气施以气化过程，化生气血，灌溉脏腑。上中下三焦如天地人之三才，上焦主入，中焦主化，下焦主出。

故三焦之为病可遍见脏腑经络，表现为气机痹阻、清浊冲逆、瘀血结滞、痰湿结聚、痈脓痛塞、癃闭淋下、阴阳俱厥、内外不通等。这也为吴鞠通以三焦治湿热提供了最佳解读。

以元气阴阳四时五行六气论为纲领，确实地、系统地阐述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也多有创见和亮点。

例如以阴阳体用四时五行诠释五脏，从生成之道论达其存续之道，意境

高蹈。

以六气模式解读仲景《伤寒论》六经，比之历代所论及的经络说、气化说、八纲说、六步说、六地面说等诸说有独到之处。既合四时阴阳（三阴三阳）之阴阳离合表里内外，又属六气病因分证论治，还以六气之理阐述各经治法治方，卓为一家之论。

体大思精，独具创辟，以一部论著使中医理论从发生到要妙尽收眼底。全书合人心智，促人解读。读后令人钦佩作者的学术功力和勤奋不懈的治学态度，我以此序言向作者祝贺。

孟庆云

2013年7月28日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前 言

人类与生俱来就开始有意识地 and 疾病作斗争，所以医学不仅有着最为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最为广泛的人类智慧沉积。悠久的历史过程，广泛的智慧参与，意味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医学必然会因随各自发生形成时期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生活环境等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

中华民族的主流医学先后经历了原始经验医学、巫祝医学、中医学，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医学阶段。毋庸讳言，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医学的主流话语权已经交接给科学医学。但与此同时，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仍然不同程度地活跃在人类医学舞台之上，这其中最广泛、最重要者，非中医学莫属。

中医学历史源远流长，至今生生不息，且依然傲立医学之林，无疑说明其理论实践体系的合理性、有效性、实用性至今无法否认，比之当今科学医学，其多方面的优势独到之处仍然无法割舍。

然而，对于今天仅仅接受了科学文化思维教育熏陶的人来说，在感恩中医学带来的生命健康，感慨中华先民这一冠绝千古的杰出文化创造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无法回避的困窘与尴尬：这个和现代科学医学在理论上、实践上皆截然不同的医学文化体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今天、今后又该如何扬弃发展？

上述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基础。因为不能正确回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就很难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而不能准确解答中医学各种理论观点的确切内涵，就奢谈高论如何扬弃，如何创新，无异于盲人摸象，胡乱弹琴而已。信史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发展变革历程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这个简单而又颠扑不破的规律事实。

所以，中医学无论是继承还是发展，皆离不开其发生学的系统深入研究，特别是当今中医学的思维逻辑方法及其哲理思想灵魂变成普世主流科学文化的异端时代，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

任何文化知识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要正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置身于其发生时代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极端重要。所以解答中医学是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将认知视野置于中医学的发生时代。

中医学到底发生于什么时期，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秦汉之际，中医学的临床理论实践体系已经完善成熟，这是有目共睹的，谁也无法否认。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常识逻辑看，人类任何一项文化创造，都不会是一夜之间一挥而就的。特别在早期人类社会，文化创造更是有着尤为漫长、艰苦卓绝的探索积累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中医学的发生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时代。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中医学是一门以人体生命学为核心的，汇通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宇宙哲学、人文社会学等多种文化知识的高度复杂学科。在远古知识信息流通非常迟缓的自发文化交流汇通时代，学术上要将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水乳交融般地整合在一起，绝非百千年就能够做到的。

所以中医学发生形成时期肯定远早于战国秦汉之际。这就是说，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时间上必须从春秋战国及其之前数千年时期的历史长河中入手。

不同的文化知识不仅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还有其特定的文化知识基础。要准确理解一门文化知识的内涵精髓，把握其直观的研究对象知识无疑是必需的，但作为构建这门文化知识体系的深层次基础性知识也不能忽视。同样，要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全面了解构建形成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类别，进而确定整个研究的知识着力点及其结构逻辑关系线索也非常关键。

中医学首先是一门关于人体生命学的文化知识体系，所以医学身份无疑是其第一文化要素。中医学的生命学理论实践体系是在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指导下构建形成的，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是中国古典宇宙哲学观的核心

理论体系，所以中国古典宇宙哲学是中医学的第二个文化要素。元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又是基于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形成的，所以天文地理学及气象历法学是中医学潜藏在深层次的第三个文化要素。

中医学的文化要素特点，决定了其任何学习研究都不能仅仅简单局限在人体生命学领域，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乃至人文社会学皆不可偏废。尤其是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对这些领域的知识学习把握更为重要。

中国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散见于古代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所以要正确解答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在知识视野上，除了需要高度关注中医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经史子集诸家之学中汲取大量古典宇宙哲学、天文地理学、气象历法学、人文社会学等知识。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力水平等的不同，即便面对同一事物，也常常会因为认知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大相径庭、形式各异的文化建构逻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化认知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只有置身于相应历史文化的特定视角环境中，才能真实体验感悟同一事物确有“岭”成“峰”的巨大差别。

同样，在中医发生学研究中，只有深切体会其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式，方能准确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体系的建构形成过程。特别是生逢当今主流科学医学的建构逻辑及认知思维方法大异于传统中医学的文化语境时代之中，学会如何有效利用中医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独特文化方法来研究解读其一系列思想内涵的建构形成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关键。

中医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原始农耕文化。原始农耕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影响农作物生长发育成熟过程的各种时空环境因素，以及自然界生命万物的起源发生形成演变过程。

原始农耕文化的这种客观内在需求决定了中华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宏观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之中。包括中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天人合一”整体关联宇宙观、“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动态变化宇宙观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宏观的天文地理及气象历法学文化认知而形成的。

与之相适应,强调从微观到宏观、由简单向复杂方向的,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物负阴而抱阳”等理论诠释的思辨性宇宙演化学及生命发生学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科学医学根植于科学文化土壤之中,科学文化源自欧洲原始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有效提高狩猎的成功率,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个体技术与实体工具的创新。

原始游牧文化的这种内在需求决定了欧洲先民的文化认知视野必然侧重在微观个体事物的结构实质研究上。包括科学医学在内的科学文化所秉持的静态解剖实证原则、微观结构思想等正是基于这种个体分解认知思维而形成的。

与之相适应,强调从宏观到微观、由复杂到简单方向的,倡导个体物质技术创造的,遵循从物质整体到组织分子,再到原子、质子、电子、中子、强子、夸克等的实验性自然科学文化观,以及生命科学构建逻辑模式也因此得以确立。

相较于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有着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方法学。而这种文化方法学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文化体系对包括人类等自然界生命万物在内的宇宙天地自然万象发生存续机制的认知解读出现了巨大差别。

身处当今强势科学文化及科学医学语境之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了解中西两种文化方法的区别,并能够自由出入于两种文化方法之中,是非常必须的。盲目地以西解东、评东,或以东解西、评西,都将造成相应文化的人为灾难。

研究中医发生学,除了需要确定正确的研究时代、准确的研究对象,并掌握其独特的文化建构方法学之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同样非常关键。中医学怎么发生的这个问题,本质上属于文化史学研究范畴。而研究历史,最常用的依据非纸上文献莫属,但单凭纸上文献,很多时候又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特别是远古史,这一问题矛盾更加严重。

道理很简单,首先,由于各种因素,天地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所发生的

大小事情真正能被记载下来者少之又少，有些事情即便当时记录下来，但也可能因为各种变故而再次亡佚，类似的情况历史越悠久，程度必然越严重。

其次，现存涉及先秦尤其是三代以前的文献，大多是春秋战国及其以后时期的翻译、辑佚、传述之作，其中难免不实、以讹传讹之词，如何去伪存真是一门高深艰涩的专学。

所以在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文化史学考证中，如何弥补纠正文献信息这些难以避免的缺陷，是古今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的问题。这其中，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倡导以地下出土文物来验证、弥补、纠正纸上文献信息。

二重证据法的史学考证价值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地下出土文物作为一种固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证，后世难以完全伪造复制，所以一旦某一历史事件得到当时出土文物的资证，其可信性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过，这不等于说二重证据法就是一种可以解决所有史学悬疑的完美无缺的考证学方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上当初造作的物化证据本来就很少，这些证据要保存下来难度更大。而且，同文献史料的流传一样，固化的文物也随着时间的迁延，亡佚毁坏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史学考证中，寻求地下文物的考据支持，虽然理论上非常理想，可现实的难度几可比肩大海捞针，如果仅仅苛求胶柱于这种考证方法，大概3000年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民族国家都几无确切历史文化踪迹可言，中医学尤其是如此。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朱熹认为，研究判定某一事物历史真伪的方法有两条原则：一是“义理之所当否”，二是“左验之异同而质之”。

所谓“左验之异同而质之”其实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得到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的资证。而“义理之所当否”则是强调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合理、准确、全面地解释研究对象的本意，以及研究结论的结构秩序组织是否符合相应的文化理则规律。用现代术语来诠释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结果得出的全部过程是否符合逻辑。

世界上没有绝对偶然的事物，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深层次的规律机制。就文化知识的发生形成而言，任何一门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形成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而且还有其内部诸多文化元素之间的严密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及其规律过程。而借助于义理逻辑研究方法，不仅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门文化知识内部文化元素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发现其规律过程、再现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基础、还原其内涵本质，为辨别真伪打下最可靠的理论依据，而且还能及时发现其体系中的各种问题缺陷，为其进一步地修正完善、扬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自由出入儒释道各门，纵横驰骋百家之学，洞明集成数千年国学之精蕴，创造形成新的文化思想理论，成就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其研究方法上正是因为得益于这种独到的义理逻辑研究法。所以在笔者看来，义理逻辑研究法在文化史学研究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医学是一门荟萃诸多不同文化类别知识元素，结构关系非常复杂、建构过程相当漫长，历史非常悠久的历史知识体。要全面准确地认识把握中医学内部不同文化元素的形成时代及其文化背景特点，客观合理地阐释它们之间的时空整合顺序关系过程，最大限度地揭示还原其内涵本质，直至中医学的修正完善及其扬弃创新发展，义理逻辑研究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应用价值。金元明清时期中医学流派的色彩纷呈，以及各种新思想、新理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宋明理学所青睐的义理逻辑研究方法的使用。

基于这种文化史学研究观点，本书在原始中医学发生形成的历史时空过程、剖析中医学文化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立论新的观点、区分诸家学说是非、鉴别取舍历史文献等，皆守义理逻辑底线。凡义理逻辑通畅，又得文献、文物，以及生活实践等佐证者，皆采信用之；凡义理逻辑不通者，即便有文献存说，亦作非是为伪处理。可以说，本书之所以从思想到理论到实践，形成诸多异端概念，皆是根源于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探究阐发中医发生学不仅仅是因为民族文化血脉感情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医学所面临严峻现实的迫切等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存照千古